

王学胜 ◆ 著

A Critical Study
of the Root Literature

“底层文学”批判



 吉林大学出版社

通化师范学院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底层文学”批判

王学胜/著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底层文学批判 / 王学胜著. — 长春 :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4.12

ISBN 978-7-5677-2778-6

I. ①底… II. ①王…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评论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98913 号

“底层文学” 批判

王学胜 著

责任编辑: 张树臣 责任校对: 冯慧心

封面设计: 张沐沉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春科普快速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2015 年 6 月 第 1 版

印张: 12.75 字数: 200 千字

2015 年 6 月 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77-2778-6

定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 长春市明德路 501 号 邮编: 130021

发行部电话: 0431-89580026/28/29

网址: <http://www.jlup.com.cn>

E-mail: jlup@mail.jlu.edu.cn

前言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文学，时代性作为文学的突出特征体现在文学作品当中。中国新世纪“底层文学”是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产生的，是知识精英叩问“现代性”在文学中的反思。有论者把“底层文学”的历史追溯到《诗经》，认为只要是彰显底层关怀的文学就都是“底层文学”。本书反对这种提法，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来界定“底层文学”，“底层文学”的命名和区别于其他文学就没有什么实际的价值和意义。既然我们把“底层文学”看作为一种独立于其他文学样式的“新品种”，那么它必然反映了其他作品不能或不擅长的东西。这种文学样式阐释特定时间界限的现实，记录具有历史性的社会现象中底层群体的心理痕迹。从这个角度来说，“底层文学”可以反映在官方正史中所故意“舍弃”的内容，从而为后人留下记录这个时代的“补充”。据2013年1月26日的《经济学家》报道，2012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474，2011年为0.477^①，2008年达到0.491的峰值。参照联合国相关组织的标准：基尼系数为如果在0.4与0.5之间，则表明收入差距较大，超过0.5即表明收入差距悬殊。官方发布的过去十年的基尼指数均未超越0.5，与民间发布数值之间的巨大差异让我们不得不去思考中国目前的收入分配的差距问题。按照国际上通行的贫困标准线测算，中国目前共有超过1亿人仍处于贫困线以下。如果说收入分配是否悬殊的问题还有争议的话，下面的数字会让我们看到问题究竟有多严重：1993年，中国内地政府制定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就明确提出：“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本世纪末达到4%。”但是，到20世纪末为止，这个目标根本没有实现。直到2012年，也就是目标截止的12年后，中国国家财政性教育

^① 远低于2012年12月9日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发布的0.61。

经费支出 21 984 亿元，首次实现 4% 的目标，为近 20 年来最高。这似乎是一件值得激动的大事，然而实际上 4% 仅仅是欠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中国的公共卫生绩效在全球排名 187，在 191 个成员国中排倒数第四。从上述两组数字中我们很容易看出，教育和医疗问题仍然是 1 亿多底层民众无法解决的难题。当我们的习主席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宣言要在 2020 年基本建成小康社会时，“底层文学”的作家们都知道这有很漫长的路要走。武汉农民工跳骑马舞讨薪的事件，网民们在浏览时基本上是出于好奇心的驱使，没有多少人会想到如果一年的薪水付之东流，这些农民工的子女可能就上不起学，他们自己包括家人可能就会有病看不起。因此，关注社会的底层，是作家肩上所承担的责任和时代赋予他们的光荣使命。新世纪的十几年当中，大量描写底层的文学作品出现，当中不乏优秀之作，但更多的作品却存在很多的问题。因此，针对“底层文学”的研究显得意义重大。

一、底层与“底层文学”的概念

在研究“底层文学”之前，我们需要先确定“底层”这个概念，“底层”是一个社会学概念，最早是 20 世纪初期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使用的。它原意为处于被统治地位的社会群体，是马克思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被压迫阶级，它被排除在欧洲主流社会之外。20 世纪 80 年代初，印度学者将单词“Subaltern”翻译成“底层”、“属下”、“下层”。他们所使用“底层”的这一概念把“庶民性”或“底层性”作为这一特定社会群体的共同特征。借助“底层性”这一典型特征将所有被压迫受剥削的社会群体一并划入“人民”中来。在中国，“底层”作为一个术语，较为系统的阐述最早是在陆学艺编著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一书当中，该书是这样定义“底层”的：对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和组织资源（政治权利）的占有程度极低的阶层。陆学艺基于所从事的行业，以上述三种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将社会所有阶层划分为十大阶层。那些很少或者基本不占有这三种资源的群体被划为底层，其来源主要是工人、农民、商业服务业人员和无业、失业、半失业人群。2011 年 11 月 29 日召开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决定，将农民人均年

纯收入 2 300 元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中国的贫困人口超过一亿人^[1]，按照陆学艺的划分标准，他们都可以被划入底层。

当描写底层生活的作品大量涌现的时候，学者们开始考虑如何来界定这一新兴的文学现象。大多数学者们倾向于“底层文学”这个称呼。蔡翔在 1996 年第 5 期《钟山》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散文随笔《底层》当中较早地提到了“底层”一词，散文中的底层人物形象是特指的、更情感化，主要是指在苏州河边棚户区生活的体力劳动者。陈思和在一篇题为《文学如何面对当下底层现实生活——关于长篇小说〈泥鳅〉的讨论》，第一次提出了文学领域内的“底层”概念。在文学作品中，所有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地位处于最低层面的群体或个人，都应该称为“底层”。面对社会的“弱势”群体，我们应该给予其更多的情感关怀和人文关注。这些“底层”往往以清洁工人、建筑工人、煤矿工人、留守在农村的妇女、儿童和老人等形象出现在作家们的作品中。尽管争议颇多，但所有的观点都未否定一个事实，即底层与社会弱势群体的一致性。例如留守乡村的耕地农民，在城市艰难求生的进城务工者，甚至城市的失业、无业、低保人群等等。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所说的“社会弱势群体”不是一个紧密的社会群落。它只是存在于假想中的“社会共同体”，离开了学者们的想象与假设就变得松散无比。它的存在还决定于与其相对立的整个社会组成的上层社会的出现。二者在权力等级中处于两个相距霄壤的世界中，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都是如此。福柯对此曾有精彩论断，认为权力与话语之间是相互构成的关系，权力的大小直接决定了话语的强弱。与上层相比较而言，“底层”在权力等级和话语等级中都处于明显的劣势。“底层”在话语等级中往往是被动的接受者，而“上层”一般充当话语的主体。二者之间这种“位差”明显的话语关系决定了“上层”习惯于把话语一股脑地强施于“底层”，无论“底层”愿意与否都必须充当话语的客体，完全表达了自己的本意识。就此，马克思在谈及法国复辟时代的农民时说：“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2]《东方学》的作者萨义德把这句话放在了他的这本著作中。这表明，真正的“底层”或许并不存在，“底层”只存在于关于“底层”的表述当中。

“底层文学”在其实践过程中始终承载着社会生活的点滴，其概念在界定时就带着上一世纪现实主义的厚重的痕迹，而这个印痕又与它所产生

的社会背景和时代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似乎带有对过去的承继，目的显然是为了对底层利益的呼吁以及让其更加晓畅、易于接受，也就是说这个概念不能作为一个中性的概念存在。它所指向的内容与其他文学样式，譬如“新写实主义”、“现实主义冲击波”、“寻根文学”都有本质的差别。它作为一种新的文学范式，不可能凭空产生，它具有中国文学中对道德的重视以及同情弱者的一贯立场。就实际情况而言，“底层文学”是一个带有极强批判精神的术语，它对现实抨击的源泉是有其历史因缘的。自古至今，文学和社会始终就是无法分离的“兄弟”，任何思想运动都能在文学作品中找到影子。现在大家认可的理论，塑造了中国近现代文学。当然当代文学的构成要素要复杂得多，上述条件只是构成“底层文学”部分、非本质的要素。因此，我们讨论“底层文学”是应该只把历史作为参考，而不能不作区别地一股脑把历史成规作为真理继承。

这么说来，“底层文学”的提出自始至终都是缺乏深入思考的。在一定意义上，“底层”的命名方式带有某种思维的情性行为，包含着以某种意识形态为核心，组建结盟来面对生活磨难的假想。尽管，现在“经济主宰一切”的观念流行和全球化思潮的冲击，导致这种假想仅仅成为一种无奈的文学书写和无助。假若我们以固有的眼光来对待“底层文学”，我们肯定不能真实地再现这个精英头脑中打造的概念。叫人很难接受的是，面对如此驳杂纷繁的事实，我们不太容易弄懂，“底层”究竟指的是什么？我们话题指向的“底层”是未来长期得不到“身份”且身世复杂的“私生子”。“底层”始终处于变化当中，只有在内心牢记它，我们才能真正开始关于“底层文学”的讨论。

本书所论及的“底层文学”，是指在现代性的大工业背景下尤其是中国社会经济转型以来，以社会底层的人群为主要描写对象，通过对其日常生活处境的真实再现以及对精神、心理层面的关注，来展现对底层的同情与关怀或揭露与批判的一种文学样式。

二、“底层文学”研究历程

一大批精英阶层和草根阶层书写者加入到底层叙述的文学创作当中，随着作品数量的增多，批评界和读者对其关注日增。作为纯文学阵地的期

刊如《当代》、《十月》、《清明》、《收获》、《钟山》、《人民文学》、《上海文学》、《小说选刊》等都有专门留出篇幅登载“底层文学”作品，这些主流期刊的媒介推举，加速了“底层文学”的热度，使其已经成为一种带有倾向性的思潮。代表作品如曹征路的《那儿》和《问苍茫》、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尤凤伟的《泥鳅》、胡学文的《命案高悬》、罗伟章的《大嫂谣》和《我们的路》、方方的《万箭穿心》、刘继明的《放声歌唱》和《我们夫妇之间》、刘庆邦的《神木》和《到城里去》、王祥夫的《上边》、鬼子的《被雨淋湿的河》、孙惠芬的《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和《民工》、陈集益的《城门洞开》、迟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和《一匹马两个人》、贾平凹的《高兴》、王安忆的《遍地枭雄》和《民工刘建华》、范小青的《城乡简史》、王十月的《出租屋里的磨刀声》和《31区》、获得人民文学奖的打工诗人郑小琼的《黄麻岭》和《铁》、谢湘南的《零点的搬运工》等等。仅仅十几年时间，“底层文学”的作品可谓产量惊人，难以一一列举。作者既有知名作家，亦有初登文坛的打工作家，同时不乏为读者所“陌生”的底层作者。与此同时，“底层”和“底层文学”成为当下一个重要的话题，频繁出现在学术研究会上以及文学期刊的理论研究栏目中。

《上海文学》的编者在1998年第7期上，以《倾听底层的声音》为题刊发了编者的话，并随后推出燕华君的《应春玉兰》等小说。编者在杂志上说：一种声音应该渐渐强大起来，来自底层的呼声日益高涨，底层的利益决定了立场的公平与公正，善良得到发扬，罪恶得到惩罚。在每时每刻，我们必须想办法了解底层的心声，探求底层民众内心的想法，底层人民的生活境遇如何？这种对于底层世界的了解，是应发自内心的，而不是慈悲的同情与怜悯作祟。即便是出于好意的对于底层人民的怜悯，都是对他们的不尊重。我们决不能放弃的是公平与公正，还有平等与共享。对此，我们目前更加重视，因为它不仅代表底层的利益，而且牵扯到我们全体公民的切身利益和整个社会的和谐、繁荣与健康。在一个丧失正义与公正的环境里，“假想”必然横行，其结果必然是导致社会的灭亡。但令人振奋的是，我们正在步入公平与公正的社会，与此同时，底层的声音推动平等与公正的进程。随后，围绕“底层文学”所进行的研究越来越多，其中不乏质疑的声音，如《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5期发表的葛红兵关

于长篇小说《泥鳅》的批评文章《让农民发声，还是让农民沉默——我对尤凤伟〈泥鳅〉的批评》。围绕小说《泥鳅》的相关研究在过去的十年当中已经近40篇之多，虽然零散却一直未曾中断。新世纪的这十二年中，“底层文学”一直未受冷落。但是大多数学者认为“底层文学”在2004年开始才逐渐被理论界所接受并极力推介，因为这一年曹征路的代表作《那儿》发表在《当代》第5期上，它标志着“底层文学”作为一种文学潮流从那个时间正式兴起，小说发表后自然亦激起了评论界对其浓厚的研究兴趣。

张韧于2004年在《文艺争鸣》上刊发题为《从新写实走进底层文学》的文章，正式提出了文学上的“底层文学”的概念。同年，第2期的《天涯》设置了“底层与关于底层表述”栏目，刊登了蔡翔的旧作《底层》、刘旭的《底层能否摆脱被表述的命运》和王西龙的诗歌《你是不是如同我的母亲——致宝马事件里的农妇》，把文学研究与社会学内容结合起来。第3期印发了两篇分别由高强、蔡翔与刘旭撰写的探讨底层相关问题的论文。第6期第三次组织专栏，发表摩罗的《我是农民的儿子》、吴志峰的《故乡、底层、知识分子及其它》、顾铮的《为底层的视觉代言与社会进步》、王晓明的《L县见闻》。陈晓明、王文初等人的文章随后刊发，论文都把“底层”和“底层文学”作为讨论的核心话题。这些学术文章对于“底层”的关注和思考，引发了学术界对“底层文学”的强烈反响。

“底层文学”为什么在2004年被提出，并在随后两三年中成为学术热潮，这和社会生活的变化是密切相关的。首先，20世纪90年代，政治上曾是国家主人的工人阶级，由于企业改制、破产重组等原因，大量失业，逐渐发展成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处于劣势的弱势群体。而这种态势在新世纪初初期更加严重，从而导致社会分层现象日趋严重。上层官商、中产精英、下层工农和城镇失业人员。其次，知识分子的地位较比从前下降了许多。原本是上层的知识分子，其话语权的丧失导致地位的降低。但是知识分子不会甘心变成真的底层。因此，知识分子中的作家会发挥其职业特长，通过底层窘迫的文学再现，吸引政府上层的关注，继而重拾丢失的话语权。“底层文学”真正成为当代文坛的热门话题。

这种热潮自2005年开始一直延续至今。南帆、孟繁华、贺绍俊、蒋

述卓、丁智才、牛学智、王尧、张清华、吴亮、王晓华、毕光明、谭光辉、李遇春、张颐武、李云雷、洪治纲、邵燕君、雷达、刘再复、葛红兵等数十位知名学者都发表了关于“底层文学”的学术论文。2005年之后的几年中,《文学评论》、《当代作家评论》、《文艺争鸣》、《南方文坛》、《文艺理论与批评》、《东南学术》、《长江学术》、《探索与争鸣》、《理论与创作》、《上海文学》、《天涯》、《长江文艺》、《时代文学》、《江汉大学学报》、《湛江师范学院学报》等期刊杂志都相对集中地发表有关论文。这些论述紧密联系当时的“底层文学”创作和批评实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一些学者还总结和反思了“底层文学”相关研究本身的问题和缺陷。作为文学讨论内容发表的重要阵地的《文艺报》,自然不会对此热潮漠不关心,多次刊发“底层文学”的相关文章。例如在2005年2月24日发表乔丽娜的《聚焦底层凸显人性》,4月21日刊登石一宁的《“关注‘打工文学’是批评家的职责”——评论家杨宏海呼吁关注底层写作》,8月2日登载范咏戈的《胡学文中篇小说〈莽莽的日子〉等五篇底层写作:对小说的一种召唤》等。2006年,《文艺报》保持了对“底层文学”问题的关注,对“底层”和“底层文学”问题展开学理思辨。相继刊发了石一宁的《“底层文学”引发思考》(1月21日),刘勇、杨志的《“底层写作”与左翼文学传统》(8月22日),颜敏的《底层文学叙事的理论透视》(10月12日)等。从这些文章我们可以察觉出学界对于“底层文学”研究的逐步深入。

关于“底层文学”的作品评价、理论研讨的学术会议也在不断召开。也是在2005年的12月18日,《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杂志社举办了“‘底层文学’与20世纪中国经验中的左翼传统”座谈会。随后,《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杂志社于2006年4月18日至19日,组织召开了“底层与文学”为主题的研讨会,刘庆邦、杨显惠、阎晶明、萧夏林、张柠、孙郁、李洁非、李建军、李静等数十人参加会议。学者们讨论了“底层、底层问题与知识分子使命”的话题,然后对“底层能否摆脱被表述的命运”进行了深入探讨。2006年11月2日至5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召开第14届学术年会,年会主题为“从新时期文学到新世纪文学”。“新世纪文学”和“底层文学”两个方面的讨论成为该次会议的重点。2007年4月14日至15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和扬州大学、中国现代文学

馆、《文学评论》、《文艺争鸣》、《文艺报》六家单位联合举办了“‘乡下人进城’：现代化背景下的城乡迁移”文学研讨会，关注了特定的城市边缘群体。2007年11月1日至4日，中国新文学学会、江南大学文学院共同举办了“中国新文学学会第23届年会暨‘底层创作与和谐社会’学术研讨会”。之后的五年当中，还有很多的学会、高校、作协和网站等都组织了类似的大大小的研讨会，限于篇幅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可是关于“底层文学”相关话题的讨论缺乏像其他文学那样脉络清楚、逻辑清晰的特点，由于它的理论背景模糊且众说纷纭，加之审美差异过大，往往无法依据现有理论来判断某一文本价值的大小。随着争论者把多种理论引入到“底层文学”的争论当中，“百家争鸣”的局面正在形成。

这种多元化的研究态势，主要体现为六种理论主张。第一种是强调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与责任使命。例如，南帆、蔡翔、单正平等人是这种理论的发起者。南帆认为大多数情况下，能够有能力表述底层的力量都是来自于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完成对底层进行言说和叙述。知识分子因为能够熟练应用各种传媒手段，加之他们丰厚的知识积淀和文化资本，决定了他们在公共空间中具有良好的表达能力，不做沉默无声的群体。“他们将实验室里追求真理的精神扩展到社会事务上。”^[3]这就是知识分子表述底层的根本原因，它承担了社会的责任和义务，同时超越了一己私利乃至小集团的利益。此外还有贺绍俊、陈晓明和孟繁华等人为代表的认为“底层文学”应挑起启蒙的重任。贺绍俊在论述当中把作家刘继明作为例证，他说启蒙精神是刘继明小说当中最成功的地方，并认为刘继明通过作品重新思考了中国社会的现代性问题。“刘继明所要批判的不是鲁迅当年所批判的国民性，而是建立在体制内思想框架下的‘新国民性’。”^[4]第二种是消费主义文化理论。例如白浩“从奇观化的内容”、“欲望化的主题”、“偶遇化情节”等方面批评了“底层文学”中的错误倾向。他认为出现这些现象的原因就在消费主义，是“消费主义流向指向市场运作规则，它要迎合和刺激消费的欲望，使其获得消费的满足感。”^[5]想要实现内容上的奇观化只有对底层生活的陌生化领域和独特生活经验进行深入的挖掘，然后再对所叙述的事情进行夸张化处理。第三种是美学角度。如左芬在评价范小青的小说《父亲还在鱼隐街》（《山花》2007.5）时写道：“这个故事很具有

艺术性，它用隐喻的手法把一个现实的农民工女儿寻找父亲的故事与现代人精神上的迷惘感结合在一起写，这可以说是一种比较新的写法，很具有一种现代主义的意味。这与一般的写底层的大部分现实主义的作品颇有不同。在叙述之外给大家留下更多的悬念和猜想的空间。这应该说是‘底层写作’的一种积极、有益的尝试。”^[6] 第四种是二元思维，即城乡社会二元结构。如徐德明就在《“乡下人进城”叙事与“城乡意识形态”》（《文艺争鸣》2007.6）中认为，“底层文学”应反思农民的生存，思考农民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农业与现代性的互动。令人失望的是“很多小说没有顾及对作为背景的现代性进行的反思，也很难见到对城乡意识形态的认知与批判。”第五种是政治意识形态角度。如程波和廖辉认为，“底层文学”是部分精英通过文学艺术方式向底层大众的靠拢，在此之前，一些“新左派”精英在道义上与大众结盟。“其内在驱动是情感的、道德的，但说到底意识形态的。”^[7] 第六种是“左翼文学”传统。譬如李云雷的《如何扬弃“纯文学”与“左翼文学”？——底层写作所面临的问题》、白亮的《“左翼”文学精神与底层写作》、何言宏的《当代中国的“新左翼文学”》等系列论文，把“底层文学”的传统上溯至“左翼文学”，指出“新左翼”倾向是“底层文学”中较为外显的方面。

然而如此多元的研究格局，并没有带来“底层文学”相关研究真正的进步。学者们“百家争鸣”，各执一词，难有共识，表象繁荣的背后是“底层文学”研究的尴尬，不论是文本研究还是理论建构，都面临着诸多问题等待解决。

三、“底层文学”研究的不足

我们先来看一下作品自身的问题，虽然“底层文学”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但好的作品却是越来越少。底层打工者为了抒发打工生活的枯燥，为了排遣“监狱式”管理对心灵的压迫，以及其他种种不公待遇，往往会把亲历的或听闻的苦难在作品中真实地再现出来。读者，尤其是打工读者，看到描写自身境遇的作品自然就会有所偏爱。就像曹征路小说《问苍茫》中的毛妹一样，虽然不懂诗歌，但看到柳叶叶在公司黑板报上写的关于汇款的小诗时也被深深打动。读者如此买账，批评家们和期刊编者自

然不会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于是雷同和苦难见诸大部分底层作品当中，其中不乏精英作家之作。最后，随着“底层文学”成为时尚，苦难也就演化为“底层文学”的标签，至于行文粗糙、人物干涩、情节突兀等缺乏文学“诗性”的方面都被掩盖了。好作品和题材有关系，但二者没有必然联系。判断一部作品是不是好的作品，除了语言之外，本人认为应该主要看其是否写出人性的深度，这种深度不会因为作品不写贫困的底层而打折，也不会因为作品未采用创新的文体而逊色。其深度如何关键要看作品中是否体现出审美的超越性——超越历史和当下、超越世俗道德、超越宗教，最终抵达人性深层的所在。因而大量的以苦难作为噱头的“底层文学”，即使是以生活中真实的实例为原型，仍免不了让人怀疑是作者为“悲剧”的震撼效果故意把主人公往死路上赶。如尤凤伟的小说《泥鳅》中，进城务工的姑娘要么去当小姐如寇兰，要么被逼疯如陶凤；进城的小伙子如果不做违法的勾当，结果是非死即残。^①这种过于刻意或者模式化的写作导致“底层文学”“嘘声四起”，尽管文学期刊中一如既往地刊登“底层文学”作品，《文艺理论与批评》等期刊仍旧开设“底层文学专栏”，但读者仍然怀疑：“底层文学”作品是数量重要还是质量重要。

不仅“底层文学”的发展现状不容乐观，“底层文学”的研究也存在很多问题，其中既有研究本身的局限亦有逻辑建构问题。首先“底层文学”的边界模糊，于是很多分歧意见和难题在“底层文学”的相关研究过程中频繁出现。当代文学批评者品格的缺失以及批评实践中的懒惰在此显露无遗。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底层文学”大多只是历史性的描述却很少文学描述，因此在评价该类作品时，所要考虑的一些根本性的因素当中，往往不会包含人物、语言、象征、意象等。这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可是问题却随之而来，因为无法归纳出“底层文学”的艺术边界，于是我们往往只是凭借印象而定或者不再思考“底层文学”究竟包含哪些作品。首先是“底层文学”的范畴不确定，造成相关的讨论并没有围绕相类同的内容进行，这就导致了评价结果的巨大差异，同时也让当代文学批评的情性展露无遗。像前面所说，对“底层文学”评价不是基于文学艺术水准，而是

^① 国瑞成为替罪羊被枪毙，蔡毅江成为黑社会老大，小谢做了一票大的从此隐姓埋名，王玉城被打住院。

更多地考虑是否合乎事实，因此在评价“底层文学”优劣时，最主要的评价因素并不是它的人物形象、语言推进、细节展现、氛围营造等。这种状态如果发展下去，一个临时的“底层文学”无法准确地勾勒出它的艺术范围，究竟什么作品算作“底层文学”，什么作品不能界定为“底层文学”就成了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由此可见，例如就所处的经济地位来说，农村留守的老幼病残、进城务工人员、失业的城市贫民可以算做纯正的“底层”。

第二是样本问题。“底层文学”研究对于样本的选取是有很大局限的，这主要是因为样本选取主要是近年来发表在大型文学期刊上的作品。这种选取方式造成了一些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优秀作品被漏掉，导致了研究的片面性和狭窄性。另外样本选取还主要集中在知名作家身上，这就更局限了研究的视野。由于知名度高，拿知名作家的作品作为讨论的起点势必更容易为大部分研究者接受。然而，有些知名作家从未在底层生活过，即使是去底层体验过生活，更多的只是走个过场，底层的内心想法他们是不了解也不想了解的。他们的“底层文学”创作纯粹是出于“想象”或基于已有的主题及事先设定的故事模式。而那些出自“无名之辈”的作者之手的作品难以成为研究的对象，无论它们是如何的优秀。研究样本的选取局限暴露了“底层文学”创作与研究的“合谋”现象。作协中的精英作家的创作与研究所或高校的研究者的研究都指向了底层关怀和构建和谐社会，前者在创作中演绎这种既定的思想，后者带着相同的思想来解读作品，两者演出了一场精彩的“双簧”。

第三，惯性思维也是影响“底层文学”作品研究的深度与广度的关键因素。例如，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让很多研究者把“底层文学”作品中展示的复杂矛盾简单地纳入城乡对立的逻辑思维当中。至于作品中所展示的人性弱点与社会的不公，研究者除了习惯思维当中固有的几种思维模式之外，就找不到更有效的剖析方式。

第四，鲜有创见的观点重复。众多的学者通过解读不同的作品阐释大致相同的问题，已经成为痼疾。这种没有创见，重复他人的做法实际上是一种学术剽窃。比如关于“底层文学”过度渲染苦难的观点，就在几十篇论文当中出现过，当然所选用的例子是经过替换的，这就是所谓的“旧瓶装新酒”，表面上是丰富了文本研究，实质上是一种学术懒惰的表现。鉴

于作者的名气，以及洋洋洒洒的流畅行文，即使有上诉弊病，仍能占领各大权威期刊的阵地。

第五，“阐释大于创作”，这是一个“底层文学”研究当中容易忽视的问题。文学的信仰时代已经远去，再也不会出现20世纪80年代时情形：社会热点题材的电影一公映，便万街空巷。这不仅仅是因为读者素质的提高，更主要的是无论是文学还是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它们都无法解决经济学家都难以解决的难题。曹征路的小说《那儿》中的主人公工会主席“我”的小舅朱卫国因为享受正处级待遇早已被工人们看成是“外人”，他两次集资救厂，均以工人血本无归收场。加之初恋情人杜月梅做暗娼夜归时被朱卫国所养的狗吓瘫痪了，原本自视为工人代表的他的生存支柱轰然倒塌，在打了一大堆镰刀斧头之后，他用自制的气锤砸瘪了自己的脑袋。工人们一夜之间沦为失去了起码的生存保障的社会弃儿，不能接受欺骗过他们一次的工会主席的第二次“欺骗”，因为他们知道了厂方给朱卫国股份的事情。作为解释更是为了捍卫心中的理想，朱卫国选择自杀作为扭转工人困境的筹码，小说中工厂的非法并购被终止。但是稍有生活经历的人都知道这更多只是一种幻想，中国内地国有资产借着盘活的名义很多都流进了权势者的腰包。当然我们不能苛求《那儿》给我们提供解决经济问题的有效方案，但是小说设计主人公的自杀情节来博取读者的同情心，目的是为了从麻木中拨开迷雾，逐渐去改变各种社会的不合理的事实。这些自然无可厚非，但是赚取读者泪水的过程，加之人物形象虚假，结尾的失真都让《那儿》在实现思想主题时留下了生硬的痕迹。为了免受质疑，曹征路多次在访谈中和会议中阐释自己作品的创作初衷和目的。一些对曹征路持赞赏态度的批评家，也对小说进行了过度阐释。莫言所提倡的“为老百姓写作”演变成“主题先行的写作”。就经济问题的解决而言，读《那儿》显然没有读郎咸平的一篇学术论文更有意义，文学活动或文学创作需要厘清自身的限度，除去生动的语言、细腻的细节、丰富的想象，文学作品在面对社会问题时实际上没有多少作用可言。因此如果处理不好创作意图与文学表现之间的关系，文学创作就可能成为一种僭越，既解决不了纷繁复杂的现实问题，也发挥不了文学独特的社会作用。

第六，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三个方面。（一）如何表达底层生存。在做这个层面的研究之前，需要确定一个前提：暂时抛开目前的争议，把

“底层文学”的创作主体限定为精英阶层作家和从“打工”等底层身份逐渐成长起来的底层书写者。于是，需要我们花费精力且用心面对的是如何更好地表达“底层”，以及精英阶级是否被允许书写底层就一点也不重要了。如何更好地表达底层。其一，“底层文学”的“文学性”与“大众性”，即“雅”与“俗”的问题。“底层文学”若想成就当代及后世的经典作品，“文学性”是撇不开的内容，而“底层文学”作为一种新的文学范式的独特性又要求其符合“人民性”的要求。一种只讲求形式的文学不可能既有效地获取丰富和复杂的底层经验，又饱含深邃的审美意蕴。二者既然不是水火难容的宿敌，如何才能找到最佳的“黄金结合点”？其二，“底层文学”和左翼文学究竟存在怎样的关系，后者的某些光荣传统能否成为前者的典范？其三，“底层文学”如何脱离现实主义的束缚？真正抵达了那些默默无闻的弱者的精神内部，真切地融入到生命的性灵当中。其四，情感距离的把握。“底层文学”作家的理性思考因为同情心的“泛滥”而缺失在很多作品中普遍存在。如曹征路的小说《问苍茫》中化解劳资的矛盾的希望寄托在工人的法律维权意识的觉醒上，显露出作者对问题理性分析的不足。作者站在打工者的立场上完成小说的叙述当然无可厚非，但是，如果囿于对打工者的同情心理，否定资本在经营管理中所承担的巨大风险，则是根本未触及当今社会经济复杂问题的实质。洪治纲毫不留情地道破问题的症结所在：“作家普遍地陷入了某种迷惘性的同情误区，缺乏必要的叙事节制和独特有效的理性思考。”^[8]洪治纲又进一步指出：白璧德作为一位新人文主义的大师，他认为只有用判断与思考来制约同情，同情才不会泛滥，人文主义才能与其身份相符。“真正的人文主义者在同情与选择之间保持着一种正当的平衡。”^[9]本人是十分赞同洪治纲的观点的，我认为如何克服情感对于思考的僭越是“底层文学”创作中亟待解决的难题。

（二）作品文本价值的评价。文学基本价值的分析和认定，是所有文学研究都不能动摇的核心，“底层文学”当然也是如此。目前对“底层文学”文本价值体现出两种取向：一种是从文学性角度的“棒杀”或从关注现实的角度的“捧杀”；另一种是“和稀泥”式的价值判断，先说出作品的价值所在，接着再找几点不足，这样既不得罪作家，也显得考虑周全、思路周密，但是在分析文本艺术价值的不足时，大多是笼统的讨论，

很少有较强说服力的细致剖析。这些停留在作品主题、人物和情节层面上的分析，因不能深入文本的内在肌理，既不能阐释作者的审美追求，也无法做出准确的价值判断。文学艺术的本性决定了“底层文学”优秀作品的筛选绝对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它需要时间的磨砺和淘洗。我们若想建立对单篇作品乃至“底层文学”整体准确有效的综合评价体系，光凭借理论话语的堆积是实现不了目标的，只有进入个体文本中去发现其审美的独到之处，并且还要杜绝片面、角度单一的毛病。

实际上，文本分析做得如何直接关系着文学研究的发展。通过文本分析可以评判文本传达是否有效地表现了作者的主观创作意图，从而把作品与经过时间检验的经典作品作出比较，为进一步的价值判断做好基础性的工作。只有富有见地的文本评析，才能找到作品中真正的“诗性”所在，从而建立作者提升作品艺术空间的方向和目标。在“底层文学”创作的一线作家中，有很多人对自己的作品，不仅充满自信，而且在访谈录中为自己的创作理论寻找经典作家的言论支持。例如陈应松就与李云雷的访谈中说：“有一天我读高尔基终于看到了他的这么一段话：‘对人类和人类的各种情况作真实的赤裸裸的描写的，谓之现实主义。’这段话就让我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好像找到了组织。”^[9]现实主义是否是“底层文学”的“安身立命”之本，只有在冷静地仔细研读作品并提供各种卓有成效的艺术分析之后才能做进一步的判断。

（三）“底层文学”接受者研究。“底层文学”把当下社会底层民众的生活作为书写对象，社会底层小民的穷苦伤悲成为其关注的重点，无论能否成为当代或未来的经典，它都要面对当下的接受群体——主要为高校学者、大学生或中产阶级等不为生活所累的人群构成的读者圈。他们中除去原本来自底层而正在求学的大学生们以外，都对底层社会的生活实际所知甚少（即便是出自底层的学者中产阶级对曾经的底层生活体验已今非昔比）而他们对“底层文学”优劣的价值定位是“底层文学”向前发展中极为重要的环节。但在以往的相关研究中，我们几乎看不到关于“底层文学”读者接受层面的研究。与此同时，“接受美学”^①早已在中国“扎根

① “接受美学”是指文学传播和接受活动中包括作者、读者、评论者三方要素之间的交流与互动。